

扁担银行和红军菩萨

红军在遵义只停留十二天，而对遵义的影响及留给当地的财富，却远非“红色”二字所能覆盖。

■ 文/余未人



红军菩萨。（贵州图片库供图）

因为得风气之先，黔北人接受新思想总比贵州其他地方，甚至比周边省份的民众更快。所以，1934年12月，当红军开进遵义城时，事先接受过革命思想传播的遵义人，由乡绅商贾带领，出城敲锣打鼓、燃放鞭炮迎接红军。

红军把没收来的军阀王家烈等人商号中的食盐、烟草公司的财物之类，统统分给一贫如洗的“干人”。

在“斗米斤盐”的年代，有些老实的“干人”畏惧这天降之财，红军就给他们一一送进家里，让百姓寡淡的菜蔬里有了盐味。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！可以说，红军带来的革命精义与遵义人的文化吸纳性一拍即合，就像种子播入了沃土。

今天，遵义红军街值得流连的去处很多，而与百姓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，就要算那种精美的二层小楼，它曾是军阀犹国才的私宅，它挂牌为“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”。

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于1931年底。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4人编成15大队，毛泽民任政治委员、曹菊如任支部书记，编入军委直属纵队长征。15大队有100多个运输员，挑着100多副装满苏区铸造的白洋、“红军票”的担子，背驮印票子用的机器随队出发。这就是特殊的“扁担银行”。

曹菊如的《长征路上的红军票》一文，回忆了苏维埃银行发行钞票的经过。他说，遵义是红军经过的最大一座城市，也是苏维埃银行唯一印制钞票的地方。

当年“苏维埃”这个外来语的含义让老百姓弄不明白，而军阀犹国才的豪华公馆一夜之间变成了发票子的银行，却是当年最轰动市井的大事。

那里发行红军从瑞金带出来的“苏票”，老百姓对这种从未见过的、印制简陋的“苏票”有种本能的拒斥，而红军政权下的商业机构，在卖盐时只收苏币，拍卖部分没收物资也优先收苏币，老百姓拿了苏币又能在国家银行马上换大洋。

这是红军“金融家”们精心设计的智慧“游戏”，它让苏币的信誉直线上升。

红军撤离前，“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”又在大街口摆桌子，通宵达旦地让百姓把手中持有的苏币全部兑换成盐巴、布匹，还有鸦片。这也许让今人难以理解，但在当年，中原已经禁种的鸦片在黔北却如同稻粟一般，也是“硬通货”。

在完成历史使命后，苏币又在黔北土城被悉数焚毁。战争年代，红军银行以极为艰难的方式维系着自己的“金牌荣誉”。

红军在遵义只停留十二天，而对

遵义的影响及留给当地的财富，却远非“红色”二字所能覆盖。

我每次到遵义，都会上红军上看一看，那是个可以观察世道人心的窗口。

山上有一尊“红军菩萨”铜雕。孰能料到，宣扬“无神论”的红军，却出了“红军菩萨”让老百姓世代顶礼膜拜。

据说红军菩萨很灵验，“文革”中有位老人生命垂危，没钱看病，家人没有上遵义佛教名山金鼎山求佛，而是于夜晚急奔红军山上祭拜，不久老人的病果真好了，而且又多活了几十年。类似的故事，在遵义时有所闻。

其实，所谓“红军菩萨”是位年轻的红军卫生员。当时伤寒病在遵义肆虐，他为救百姓掉了队，不幸被国民党军残害，当地百姓偷偷掩埋了他的遗体。由于他牺牲前未留姓名，而群众的印象是一位年龄小的红军卫生员，就习惯称为“小红军”，简称“小红”。这样口口相传几十年，“小红”就成了女红军。

1954年9月3日，遵义市人民政府将“小红”的坟墓从城南南郊桑木垭迁至城内小龙山，前往桑木垭和小龙山烧香求药者络绎不绝。小龙山也从此被遵义人称为“红军山”。

直到1993年9月，“小红”当年的战友、第三军医大学校长钟有煌才确认了“红军菩萨”就是由百色起义投身革命的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二营卫生员，广西人龙思泉。

“红军菩萨”牺牲后七十多年间，朝拜的香烛一直不灭。从此红军在遵义人心里，化为一种灵魂信仰。

（摘编自余未人《寻根在黔北》 编辑/周德瑞）